

ZHILI SHANGHUI

YU XIANGCUN SHEHUI JINGJI

直隶商会

与乡村社会经济 (1903—1937)

◆ 张学军 孙炳芳 著



人民出版社

YU XIANGCUN SHEHUI JINGJI

直隶商会

与乡村社会经济

(1903—1937)

◆ 张学军 孙炳芳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少平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张学军 孙炳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
(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丛书)
ISBN 978-7-01-007818-2

I. 直… II. ①张…②孙… III. ①商会-商业史-研究-河北省-
1903~1937②农村经济-经济史-研究-华北地区-1903~1937
IV. F729.6 F3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9012 号

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

ZHILI SHANGHUI YU XIANGCUN SHEHUI JINGJI

张学军 孙炳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125

字数:280 千字

ISBN 978-7-01-007818-2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苑 书 义

作为一个专门领域,中国近代商会史的研究真正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除海外学者有所关注和研究外,内地学者在讨论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时偶尔提及商会对革命的消极态度,内地研究基本上是一个空白。

商会史研究直接得益于商会档案的发掘与整理,因为商会档案资料的发掘整理本身就是一种艰苦的研究。苏州商会档案、天津商会档案、上海总商会史料、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史料选编等大型专题档案资料的整理刊发,为商会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中国商会史研究越来越为中外学者所瞩目,商会史研究以其勃勃生机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数以百计的专题论文和一批颇有分量的专题著作相继问世,增加了我们对近代商人阶层许多感性的认识,而且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一些相关理论探讨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基础。

但是,由于资料限制,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海、天津、苏州等大城市商会,对内地商会,尤其是对县以下小城镇商会的研究有待深入,商会与乡村社会一直是商会研究的薄弱环节。作者不避艰难,毅然选取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作为研究对象,表现了极

大的学术勇气。研究中,作者把直隶商会作为一个整体,加强对直隶区域商会网络内在关系的探讨,突破了以往商会研究中或者集中于点(大城市商会)、或者流于面(主要以大城市商会为例证来研究全国商会状况)的研究取向,在一省区域内将点和面结合起来,实现了商会研究的重心下移,在关注大城市商会的同时,加强对基层商会的研究,拓宽了商会研究的领域。

作者对1903—1937年间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进行考察,详细介绍了商会在直隶市镇的发展及其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商会与乡村商业的近代演进、商会与乡村工业的新陈代谢、商会与农业趋新、商会与乡村公益事业等问题,阐明了商会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提出直隶商会在促进乡村资本主义因素的滋生、推动乡村市镇的勃兴、催生乡村新型精英阶层、进一步密切以口岸—腹地为特征的城乡联系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成为20世纪前半叶直隶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的又一助推器。

作者对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的深入剖析,从一个侧面透视了这一时期直隶乃至华北地区,乡村社会由传统向近代演变的大致轨迹,揭示了商会在乡村社会经济变迁中的角色和作用,为我们认识乡村社会提供新的视角,不乏新意,体现出作者独到的学术见解,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挥商会等组织的作用,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2008年11月18日

于石门明月斋

目 录

序	苑书义(1)
第一章 绪论	(1)
一、基本概念の界定	(1)
二、学术史の回顾	(3)
三、本课题の意义与主要学术价值	(11)
第二章 乡村市镇商会网络の建构	(16)
一、商会在乡村市镇の稀疏出现	(16)
二、商会在乡村市镇の广泛扩展	(32)
三、商会存废风波与整顿改组	(38)
四、商会の网络化运作	(45)
第三章 商会与乡村商业の近代演化	(78)
一、开埠通商前期乡村贸易の初步变动	(78)
二、商会对乡村市场の开发与整顿	(95)
三、商会与金融市场の稳定	(104)
四、重视商事调查,推动统一度量衡	(121)

五、商会与农村捐税抗争	(129)
第四章 商会与乡村工业的新陈代谢	(143)
一、西力冲击下的传统手工业	(143)
二、商会振兴乡村工业的举措	(148)
三、乡村工业发展的社会效应	(181)
第五章 商会与农业趋新	(188)
一、近代直隶农业的困境	(188)
二、加强与政府合作,参与农业改良	(197)
三、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农产品流通	(217)
第六章 商会与乡村公益事业	(230)
一、商会与农村赈济	(230)
二、协助政府禁绝烟毒	(238)
三、兴办商学,开启商智	(242)
四、商会与交通的改善	(255)
五、商会与地方治安	(260)
第七章 商会对乡村社会影响的多维视角	(267)
一、乡村资本主义因素的加速滋生	(267)
二、乡村新型精英阶层的崛起	(273)
三、乡村市镇的勃兴	(275)
第八章 结论	(286)
 附 录	
直隶商会与乡村小农经济变迁	(291)

北洋时期直隶商会的捐税抗争	(309)
直隶商会与近代棉业发展	(316)
直隶商会的法制活动	(326)
直隶商会的近代社会意识	(339)
直隶商会与近代交通发展	(353)
参考文献	(363)
后记	(377)

第一章 绪 论

一、基本概念の界定

(一) 研究区域

本课题主要以直隶省区为研究范围。明清以来,直隶省地方行政建置变化频繁。明时,今河北省主要属于北直隶范围。清顺治初仍袭明制,称今河北省所属区域为北直隶,顺治二年(1645)始改称直隶。其行政建置,依如明朝,领顺天、永平、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8府,延庆、保安2直隶州及宣府镇。后行政建置变动频繁。1669年直隶巡抚由真定徙至保定,始定保定为直隶省省会。雍正二年(1724)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延至同治九年(1870)直隶总督兼为北洋通商大臣,驻天津,冬令封河,还驻保定,光绪二十八年(1902)后直隶总督常驻天津。至清末直隶省共领12府、7直隶州、3直隶厅。其中,朝阳府领县分别属今辽宁省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直隶州、多伦诺尔直隶厅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基本不在研究范围之列。余11府、6直隶州、2直隶厅所领州县或部分州县,在今河北省,是本文研究重点。1913年2月,天津被正式确定为直隶省的省会。1928年6月,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天津成为直属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别市。1930年,天津改为河北省辖市,省会再次设在天津。1935年,河北省会迁往保定,天津再次

改为特别市。

在我们所研究的时段内,除个别年份外,天津始终隶属于直隶(河北),行政建置虽屡经变动,但天津与直隶(河北)之间历史形成的密切关系却日渐巩固与强化。在界定研究区域时,我们把尊重历史与重视现实相结合,依据今天河北省的行政建置对直隶省区作了技术性修正。本书中直隶省与河北省是对同一区域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因为在我们研究的大部分时段称直隶,为简便起见,本研究以直隶来指称这一区域。

(二) 直隶商会

直隶商会在概念上不是特指,而是泛称。它是对直隶省域内各市县、集镇商会的统称,包括天津商会在内。在我们研究的大部分时段内,天津商会实际上发挥着龙头作用,是全省各地商会归附的中心。

(三) 时间断限

本研究在时间断限上,侧重于 20 世纪初到抗日战争前夕(1903—1937)这一时段。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1903 年 5 月成立的天津商务公所起到了“创商会之先声,促商务之进步”的历史作用^①,天津商务总会是在此基础上组建的,从而揭开了直隶创办商会的序幕。

其二,这一时段跨越了直隶商会常态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清末“新政”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并最终完成了商会网络体系的建构。

^① 《上海总商会议案录》,《第二次常会议案》。

其三,这一时段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是巨变和多事之秋,也是直隶商会最为活跃的时期,商会作用发挥最为明显,在研究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其四,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一区域首当其冲,各地商会脱离了常态发展的轨道,进入了“受制于外人”的畸形发展阶段。

二、学术史的回顾

(一) 商会研究的主要成果

近20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越来越为中外学者所瞩目,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兴领域。通过学者的努力耕耘,商会史研究成果迭出,解释范式几多转换,增加了我们对近代商人阶层许多感性的认识,而且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一些相关理论探讨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基础。

国外对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早于国内。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在华日本人就曾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对商会的活动进行过考察。随后,根岸佶和小岛淑男研究辛亥革命和商人的论文已涉及商会,而曾田三郎和仓桥正直则直接以商会为题展开研究^①。法国学

^① 根岸佶:《支那キルドの研究》,东京斯文书院,1932年;《上海のダキルド》,东京日本评论社,1951年;《中国のキルド》,1953年;《支那商人团体制度》,《支那》11卷1号;小岛淑男:《辛亥革命时期之士绅:商人阶级い上海独立运动》,《东洋史汇编》6期,1960年8月;《辛亥革命における上海独立い商绅层》,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化の社会构造:辛亥革命史の位置》,东京汲古书院,1973年;曾田三郎:《商会の設立》,《历史学研究》422号,1975年;仓桥正直:《清末の商會い中国のブルジョア》,《历史学研究》别册号,1976年。

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中也以上海商会为例^①。美国的 John S. Burgess、利维(Marion J. Levy, Jr.)、张鹏、桑福德、柯布尔(Coble Parks)的论文,或与区域经济和商帮有关,或与商会有关^②。陈锦江(Wellington K. K. Chan)在其博士论文《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商会在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以上海商会和广州商会为举证对象^③。总的来说,在半个多世纪里,国外对中国商会的研究只是零星的,未能形成潮流,也未引起学者的充分注意。这些学者的主要关注点是中国早期商会设立缘起、性质、社会职能、历史地位与作用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大量档案史料的开发和利用,引起海外学者的极大兴趣,研究中国近代商会的海外学者才逐渐增多,遍及日本、美国、新加坡、香港、台

① [法]白吉尔著,张富强、许世芬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 转引自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Burgess John S., *The Guilds of Pek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8; Marion J. Levy, Jr. and Shih Kuo-heng, *The Rise of the Modern Business Class*,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9; Edward J. M. Rhoads, *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Canton, 1885—1911*, in Mark Elvin &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hirley S. Garrett,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the YMCA*, Ibid; Chang peng, *The Distribution and Relative Strength of the Provincial Merchants Groups in China, 1842—1911*,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58; Sanford, James C., *Chinese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and Behavior in Shanghai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h. D. dissertation, Havard University, 1976; Coble Parks M., Jr.,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③ [美]陈锦江著,王笛、张箭译:《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湾等地^①。海外学者对中国近代商会的关注,在1998年于天津召开的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来自日、美、德、法、韩、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提交论文10余篇,其中以日美学者居多。

作为一个专门领域,中国近代商会史的研究真正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除海外学者有所关注和研究外,内地学者至多在讨论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时偶尔提及商会对革命的消极态度。1964年虽曾有包括商会研究在内的资产阶级调查计划,终未成事实,内地研究基本上是一个空白^②。

商会史的具体研究正式起步于商会档案的发掘与整理。20世纪80年代初,苏州商会档案、天津商会档案、上海总商会史料、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史料选编等大型档案整理工程几乎同时启动。一些零散的商会档案史料也不时被整理刊发。

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与天津市档案馆合作整理编纂的大型资料丛书《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50)堪称典范。“天津商会档案全宗”翔实记录了天津商会与其相邻的京师商会、与其商务往来最密切的上海商会和津京周围的直隶各州县商会在半个世纪中

① [美]约瑟夫·弗史官斯著,朱华译:《商民协会的瓦解与党治的失败》,《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小滨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东京,研文社,2002年(中译本由葛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金子肇:《商民协会与中国国民党(1927—1930)——上海商民协会为中心》,《历史学研究》第598期,1989年10月;李达嘉:《商人与政治: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1895—1914》,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5年版;张桓忠:《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知书房(台北)1996年版;周佳豪:《天津商会研究(1903—1916)》,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1997年;刘怡青:《商人与军阀政治(1916—1928)》,以天津为例,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年。

② 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的纷繁复杂的活动情况,其数量之多、系统之完整实居全国同类档案之冠。历经 16 个寒暑的辛勤耕耘,该《汇编》自 1989 年至 1998 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丛书共分 5 辑 10 卷 14140 余页,共计 1000 余万字,“为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作出一大贡献”^①。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与苏州档案馆共同整理编纂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于 1991 年公开出版,该丛编第 2 辑(1912—1919)时隔 13 年后终“磨成好事”,出版发行。这些专题史料的整理,为商会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预示着国内史学界中国商会史研究高潮的到来。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中,商会史研究以其勃勃生机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1981 年冯崇德与曾凡桂合撰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汉口商会》(收入《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2 年皮明麻在《历史研究》发表《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和商团》,1983 年徐鼎新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发表的《旧中国商会溯源》是大陆学者较早的商会专题论文。其中,徐文是第一篇较详细地集中论述近代商会性质、特点及作用的论文。随后,学术杂志发表的有关商会的论文日渐增多。进入 90 年代,商会及相关研究逐渐进入高潮,学术界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专题论文,使中国商会史研究成了一门不大不小的“显学”。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颇有分量的专题著作相继问世。1991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鼎新、钱小明著的《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此书是大陆第一部商会史专著。同年,朱英撰写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虞和平撰写的《商会与早期

^① 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

中国现代化》。马敏、朱英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一书,同年由巴蜀书社出版。199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敏撰写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朱英著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于1997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隔5年,关于北方商会研究的专著宋美云的《近代天津商会》,2002年8月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学术会议的召开对商会史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86年在苏州召开的以近代中国商会与资产阶级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开商会专题研讨之先河,此后,以商会为主或与商会研究密切相关的学术讨论会相继召开,极大的推动了商会史研究的深入。1987年5月武汉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经济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11月南昌第二次中国资产阶级学术讨论会,1994年8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举办的商人与地方文化学术讨论会,1996、1998、2000年香港第一、二、三届中国商业史会议,2004年厦门大学承办的武夷山中国商业史研讨会,2000年8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在湖北十堰召开的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等等,会议发表论文或直接以商会为主题或与商会研究关系密切。

1998年7月,天津社会科学院与该市多家单位在天津联合举办的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有60余篇论文发表,商会史研究被推至一个高潮。2001年5月在无锡召开的“市场经济与商会”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研究报告26篇,以对策性应用研究为主,对于近代商会的研究主要分析它的借鉴价值。2004年9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商会博物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

主办的,在山西平遥召开的“商会与近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33篇。2005年10月华中师范大学、苏州市档案局等主办的以商会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召开。

(二)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商会史研究之所以在短时期内能够异军突起,取得较好的学术成果,除了大量的商会史料的发掘整理这一基本前提外,更在于研究者敢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自觉地将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史学研究,通过研究范式的创新转换,不断推动研究视野的开拓与研究层次的提升。

大陆学者对商会史的研究最早是作为辛亥革命史的一个领域来加以拓展的,初期的研究基本上是被置于政治史范式框架之下,成为对资产阶级进行集团分析的一个样本。在深化了对辛亥革命史和资产阶级研究的同时,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的商会史研究,由于政治史范式的制约,很难有实质意义的突破。

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有力地推动了商会史的研究。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堪称运用现代化理论进行商会研究的典范。现代化范式尤其是传统—现代二元分析框架给商会研究带来新的话语、新的视野和新的思路,启发人们以系统、整体、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商会组织,从商会的组织系统、商会与社会的关系中去把握商会的性质与功能,更多地关注商会的社会属性、角色定位、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和现代性等问题,给人以柳暗花明之感。但同时又相对忽略了商会组织本身的复杂性、区域性,忽略其与传统相联系的一面,造成研究的理想化、简约化或结论先行的缺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将“市民社会”理论引入

商会史研究,并逐渐形成一种从现代化范式衍化出来的新范式,受到众多商会研究者的青睐。虽然颇具争议,但十余年来一直是商会史研究的主流范式,形成了一批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把商会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市民社会”理论采用一整套新的范畴拓宽了商会研究的视野,它从政治—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近现代社会转型,使我们更加明确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晚清公共领域的扩展与市民社会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清政府推行“新政”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其初衷是为协调官民关系,以民治辅助官治,而非与国家权力相对抗。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市民社会”理论不仅拓宽了国家与社会两极研究的深化,而且更着眼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三) 研究趋向与不足

纵观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范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交融中转换,商会史研究是不多见的特例。在最近的商会研究中,新的趋向是在选择和借鉴新理论的同时,更加注重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宋美云的《近代天津商会》就综合运用了历史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方法,以“寻求一种立体的多层次的视野,辨别历史现象中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脉络,从而在此基础上完成历史面貌的再构成任务。”^①这种研究的结果,是在一种新的视角和眼光之下,使某种具体的研究更趋精细化和精致化,展现历史的多面相,多维度,更接近于历史的客观真实。商会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已悄然开始,它不是对以往范式的推翻,而

^① 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绪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